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經濟思想簡史

下冊

叶世昌

封面装帧 邹纪华
封面题字 周志高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

(下 册)

叶 世 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5,000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书号 4074·438 定价(六) 0.79元

说 明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出版后，已经再版（稍有修改）。本应接出中册，现因教学急需，先完成下册。好在下册是近代部分，自成段落，可以先行出版，以满足读者需要。

本书由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陈绍闻同志审稿，在编写中还得到以下同志的协助：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进修的兰州大学教师张灏同志，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师徐培华同志，研究生吴申元、孔繁坚同志，上海图书馆胡群耘同志。特在此向上述同志谨致谢意。

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1
第一节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始	1
一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1
二 转化时期经济思想概述	5
第二节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	7
一 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	7
二 平均论和抑商论	11
三 农宗论	15
第三节 王瑩、徐鼐的经济思想	20
一 王瑩的名目主义货币论	20
二 徐鼐的务本论	26
第四节 包世臣、许楣的经济思想	32
一 包世臣的经济思想	32
二 许楣的金属主义货币论	39
第五节 魏源的经济思想	46
一 主张学习西方的魏源	46
二 奢俭论	50
三 金属主义货币论	53
四 通商制器论	56
第六节 洪秀全、洪仁玕的经济思想	59
一 洪秀全的经济思想	59
二 洪仁玕的发展资本主义思想	63
第七节 王茂荫、汪士铎的经济思想	67

一 王茂荫的货币论	67
二 汪士铎的人口论	72
第二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78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78
一 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近代工业的产生	78
二 “自强”和学习西方思想的发展	81
第二节 冯桂芬、李鸿章的经济思想	85
一 冯桂芬的经济思想	85
二 李鸿章的经济思想	91
第三节 陶煦、王韬的经济思想	95
一 陶煦的重租论	95
二 王韬的商本论	100
第四节 马建忠、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105
一 马建忠的富民说	105
二 郑观应的商战论	109
第五节 薛福成的经济思想	116
一 出使四国大臣薛福成	116
二 工基商纲论	119
三 机器养民论	123
第六节 陈炽的经济思想	126
一 《续富国策》作者陈炽	126
二 商务论	130
三 机器养民论	133
四 货币论	135
第三章 甲午战争后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	138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138
一 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38
二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141
第二节 张之洞、张謇的经济思想	144

一 张之洞的经济思想·····	144
二 张謇的棉铁主义·····	151
第三节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156
一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	156
二 变法的经济纲领·····	159
三 “大同”空想社会的公有制·····	162
四 “救国”三论·····	166
第四节 严复的经济思想·····	171
一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	171
二 自由贸易论·····	174
三 价值论和货币论·····	177
四 资本和三种收入论·····	179
五 消费论和赋税论·····	182
六 其他经济观点·····	184
第五节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186
一 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梁启超·····	186
二 宣传变法时期的经济思想·····	190
三 生利分利论·····	192
四 振兴实业论·····	196
五 反社会革命论·····	199
六 货币论·····	203
七 利用外资论·····	206
第六节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209
一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209
二 民生主义总论·····	214
三 平均地权论·····	220
四 振兴实业和节制资本论·····	224
五 钱币革命论·····	228
第七节 朱执信、廖仲恺的经济思想·····	234

一 朱执信的社会革命论和货币论·····	234
二 廖仲恺的平均地权论和货物本位论·····	243
结束语——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思想概述 ·····	250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十九世纪初——一八六〇年)

第一节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始

一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萌芽只在某些地区稀疏地存在,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由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以及封建势力的压制,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一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没有形成足以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力量。

土地兼并严重,地主阶级占有了全国的大部分土地。乾隆年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的大官僚和珅(shēn 音伸)就占地八千余顷,他的两个家人也占地六百余顷^①。农民要负担沉重的地租和赋税,还要遭受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盘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爆发

① 薛福成:《庸庵笔记·查钞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了历时九年扩及九省的白莲教农民起义。一八一三年又爆发了天理教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虽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斗争仍在继续。

在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并积极向世界各地进行海盗式的掠夺，寻找和开拓殖民地市场。一七五七年，清政府规定中国的海路对外通商限于广州一埠。后来在广州逐步设立了限制对外贸易的通商制度，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或称“洋行”、“十三行”）统一经营。

在鸦片战争前的百余年间，中外贸易以英国为中心。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怀着侵略目的从事对华贸易，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初，英国经常处于入超地位，即从中国输入到英国及印度的商品较多于它们对中国的输出。中国的茶、丝、土布、砂糖、大黄、陶瓷器等，很适合英国及欧洲市场上的需要。而英国运到中国的商品，如毛纺织品、洋布、金属制品等，都非中国人民大众所必需，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有限。英国早期输入中国的洋布，在品质和价格方面都不能和中国土布竞争。

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不能平衡状态，必须由英国及印度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来平衡国际收支。英国为避免白银过多流出，曾从印度向中国输出棉花，但主要还是靠鸦片。“鸦片烟在康熙初，以药材纳税，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以前，每年多不过二百箱。”^①原来主要是由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从土耳其运来。一七五七年英国占领了印度鸦片产地之后，英商就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一七七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对鸦片的专利权，从此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迅速增加。一八三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四万余箱（其中一小部分由美国和葡萄牙输入）。鸦片

^① 《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68 页。

的泛滥，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体质和精神，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鸦片大量进口，使白银由入超变为出超。鸦片战争前十年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达三千余万两。白银大量外流，使中国产生了以“银荒”为中心的货币危机。白银（一两）和铜钱（一文）的比价，清政府原来规定一比一千。银价上涨，使银钱比价变动。鸦片战争前，银一两已值铜钱一千六、七百文。银贵钱贱，以银计价的物价下跌，以钱计价的物价上涨。劳动人民的零星收入是钱，钱价下跌就使他们的实际收入降低。他们用钱去交纳以银为计算标准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以致无力交纳。这又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形成财政危机。

针对这种情况，朝野都有人提出禁烟的主张。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虽屡下禁烟和禁银偷漏之令，甚至拟订治罪条例，都无济于事。直到一八三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湖广总督林则徐等相继陈述烟祸之烈，如林则徐指出，如果不禁烟，“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①。这才使道光皇帝大为震动，以致一度对禁烟派采取支持的态度。

一八四〇年，英国对中国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同样是由于统治集团的腐朽，破坏了中国人民以及少数主战官员的抗英斗争，使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一八四二年中英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香港被割让，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协定关税，取消公行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制度。后来在《虎门条约》中还允许英人在五口设租

^①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01页。

界，有领事裁判权。这些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化。

一八四四年，清政府又被迫同美、法两国分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鸦片继续大量进口，白银继续外流，银贵钱贱更加厉害。“凡布帛菽粟庸工技艺，以钱市易者，无不受其亏损。”^①人民的赋税负担更为沉重。各族农民起义更为频繁。到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军于一八五三年三月攻克南京，将它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名天京。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十七省，同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武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

英国商人既想保持对中国的鸦片贸易量，又想增加对中国的其他商品输出。但事实上市场并没有扩大多少。一是“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②。二是由于鸦片市场夺走了其他商品市场。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在中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于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间进行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八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订立《天津条约》，还同俄国签订《璦琿条约》。一八六〇年，清政府又分别与英、法、俄订立《北京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包括增开商埠，获得内河航行权和内地通商权，扩大领事裁判权，鸦片（改名“洋药”）成为合法贸易，一般进出口货物抽百分之五的

① 吴嘉宾：《求自得之室文钞·钱法议》。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关税和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后就通行无阻，赔偿军费等。此外，沙俄还乘机掠夺了中国东北和西北约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二 转化时期经济思想概述

本章所包括的时间是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人们的思想也反映了这一转化时期的特点。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因此那时的经济思想也都是封建社会所能产生的经济思想。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在经济思想上有明显的反映，至多只是有人对商人的利益持肯定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多次出现过。

在闭关自守条件下生活的封建士大夫，根本不知道西方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还把中国看成“天朝”，认为外国人来中国通商是有求于中国，允许通商是中国对外国的一种恩惠。有的人把洋货说成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的骗财玩意，主张“严加厉禁”，并将已经输入中国的洋货“一切皆焚毁不用”^①。即使是有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家，对中外通商也抱怀疑态度。

鸦片战争前，许多地主阶级思想家对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已有所认识。有些进步思想家如吴铤（一八〇〇——一八三三年）、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改革主张。这些改革主张都超不出修补封建制度的范围。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因此其中有一些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类思想家，以龚

^① 管同：《因寄轩文初集·禁用洋货议》。

自珍、魏源、包世臣为代表。进步思想家在地主阶级思想家中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不过是在重复过去的老调,在经济思想方面表现为反对言利和重农抑商等,地主阶级作为总体来说,已经完全没落。这些唱老调的人就是这个没落阶级的思想代表。本书只举徐鼐(zī 音资)为例,以见一般。

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中的少数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外国有所长,中国有所短,提出了学习西方长处的主张。尽管他们所主张的学习范围还很狭小,主要是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标志着中国社会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变化。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以了解西方情况。魏源则是正式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由于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近代企业,使他具有了资本主义倾向。

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危机,引起了朝野对如何解决货币问题的热烈讨论。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瑬和许楣则发表了论述货币问题的专著。他们的货币理论针锋相对,分别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名目主义和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的最高发展水平。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思想是反封建的思想。太平天国革命仍是单纯的农民革命运动,它使农民的反封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晶。农民起义领袖中的洪仁玕(gān 音甘)因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直接影响,提出了包含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纲领的《资政新篇》。

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地主阶级思想家都敌视农民革命运

^① 《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4页。

动，有不少人还直接参加了镇压革命的活动。有的人在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仍希望清政府实行一些改良政策，以缓和社
会矛盾。如王茂荫因反对通货贬值而受申饬，马克思曾将他受
申饬的事写进了《资本论》的一个注中。他在货币理论上提出
了一些有意义的论点，但仍属于封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理论，没有
反映什么新的社会内容。有一些特别反动的人，则提出了为血
腥镇压农民起义辩护的理论，汪士铎的人口论就是一个突出的
表现。还有一些人在五十年代就已提出经济主张，因为在六十
年代后有发展，所以将他们放在下一章论述。

第二节 龚自珍的经济思想

一 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字璩(sè 音瑟)人，号定庵，一名易简，字伯定，又名巩祚，浙江仁和(治所在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年幼时曾随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一八一二年由副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在严重社会危机的刺激下，从一八一三年开始撰写政论。一八一八年考中举人。第二年随刘逢禄治公羊学。一八二〇年任内阁中书。一八二九年考中进士。一八三五年升宗人府主事。一八三七年充玉牒馆纂修官，改礼部主事、主客司主事。因官卑职小，“又才高动触时忌”^①，一八三九年五月辞官南归。一八四一年任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时暴病身亡。著作有《龚自珍全集》。

① 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22 页。

鸦片战争前后，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和宋学的束缚，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面向现实的社会问题。龚自珍是开这种学术风气之先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清末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①。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怀疑。

梁启超又说：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②，把他对现实的批判归之于受今文经学的影响。清代的今文经学是从庄存与（一七一九——一七八八年）开始的，刘逢禄是他的继承人之一，人称常州学派。这一学派极力阐发今文经学的所谓“微言大义”，反对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龚自珍虽然是刘逢禄的学生，属于今文学派，然而他开始写政论是在治公羊学以前。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经学内部的不同学派，学习今文经学本身并不能导致对现实问题的关心。龚自珍的“讥切时政”完全是时代的产物，今文经学只是他用来表达政治观点的一种学术形式。

龚自珍的政论，以犀利的笔触，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当时社会尽管表面上“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而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大乱将临的“衰世”^③。在这社会中，“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人心惯于奢侈，风俗习于游荡”，“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

① 《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第 122—123 页。

② 同上书，第 122 页。

③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 6 页。

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①。而统治者只知道用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有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②的办法加强搜括。由于层层贪污中饱，以致“国赋三升民一斗”，使他发出了“屠牛那不胜栽禾”^③的浩叹！

龚自珍鞭挞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庸碌无能，因循守旧。他揭露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员追求的只是功名利禄、车马服饰和子孙后代的富贵。他们从做官的时候起，就寡廉鲜耻。“官益久，则气愈偷（苟且）；望（名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接近皇帝），则媚亦益工。”^④他们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根本不顾国家的安危，一旦边疆有事，就会象鸿、燕一样飞走。靠这样一些人，怎么能治理好国家！

但是，龚自珍并不希望清王朝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他对清王朝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希望它“更法”，成“万万世屹立不败之谋”^⑤。他考进士的殿试对策，“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⑥，表明他想走王安石变法的道路。他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⑦，变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反对“拘一祖之法”，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但又认为“天下有万亿年不夷（灭）之道”^⑧，就是说他所主张的变法只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和范围内进行。他警告清王朝要吸取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教训，与其被别人所推翻，还不如“自

①② 《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③ 《己亥杂诗》。同上书，第521页。

④ 《明良论二》。同上书，第31页。

⑤ 《明良论四》。同上书，第35、36页。

⑥ 《己亥杂诗》自注。同上书，第513页。

⑦ 《上大学士书》。同上书，第319页。

⑧ 《乙丙之际著议第七》。同上书，第5、6页。